

# 《開寶藏》成都雕造考

吳 疆

亞利桑納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東亞系教授

---

## 中文摘要

《開寶藏》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雕版藏經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根據前人研究，以及如神清（？-820）《北山錄》的慧寶注等地方史料，對這部藏經於十世紀時在成都雕刻和印刷的過程進行了探討和假設，重新評價這部藏經在宗教、政治和文化層面的價值。本文提出這部藏經是在寺院的監管下完成了雕造，這個寺院很有可能就是成都的淨眾寺。本文嘗試將《開寶藏》置於唐宋流行的印刷文化之中，為東亞歷史上第一部刻本漢文大藏經的產生提供一種新的詮釋。

**關鍵詞：**《開寶藏》、成都、淨眾寺、《北山錄》、雕版印刷

# From Manuscript to Print: The Carving of the Kaibao Canon in Tenth Century Chengdu

WU, Jiang

Director,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

##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rst printed edi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the Kaibao Canon 開寶藏,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Based on previous scholarship and our examination of various local sources such as Huibao's 慧寶 annotation of Shenqing's 神清 *Record of Northern Mountain* (*Beishanlu* 北山錄), we intend to reintroduce this important canon to the scholarly world as a significant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innov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process of its carving and printing in Chengdu at the end of the tenth century. We propose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Kaibao Canon was carved in Chengdu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monastic institution, most likely, Jingzhong Monastery 淨眾寺. In sum, we situate the Canon within the widespread print culture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provide a new account of how the use of printing gave birth to the first printed Buddhist can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Keywords:** Kaibao Canon, Chengdu, Jingzhong Monastery, *Beishanlu*, block printing

開寶五年（972），宋太祖（927-976）命令雕造一部刻本大藏經，這部大藏經因此被稱作為《開寶藏》。因為這部藏經在成都雕造，被稱作《蜀版大藏經》，又因奉敕雕造，故稱《敕版大藏經》。這部雕版大藏經的開刻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因為這是漢文佛教大藏經第一次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出現。這部大藏經的開雕據稱一共用了十三萬片雕版，數量非常之大。學界公認，在漢文大藏經的版本譜系中，《開寶藏》代表了中原一系的大藏經，除此之外，還有以《契丹藏》為代表的北方源流的大藏經，以《崇寧藏》（即《東禪藏》）、《磧砂藏》等宋元雕版的各種版本為代表的南方源流的大藏經。<sup>1</sup>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套完整的《開寶藏》流傳於世，現在它的內容可以從經板保存於韓國海印寺的《再雕高麗藏》和雕造於金代的《趙城藏》中管窺。在歐美學術界，西方學者如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陳觀勝（Kenneth Chen）和傅路德（L. C. Goodrich, 1894-1986）等人已經注意到《開寶藏》的重要性，並把它引介到西方學術界。<sup>2</sup>除此之外，《開寶

---

※ 收稿日期 2020.4.26，通過審稿日期 2020.6.8。

※ 本文寫作得益於龍達瑞、馮國棟、定源（王招國）、聶順新等學者的指正，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的修改意見。本文英文初稿曾在佛光大學和高雄佛光山主辦的「2019 佛教藏經國際研討會」上宣讀並得到與會專家的反饋。本文引用的《大正藏》資料根據法鼓文理學院（DILA）與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合作開發 Cbetaonline 的標識，這裡一併致謝。

<sup>1</sup> 竺沙雅章，〈宋元版大藏經の系譜〉，《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 年，頁 271-362。值得注意的是《契丹藏》的開刻也受到了《開寶藏》的影響。參見徐時儀，〈《開寶藏》和《遼藏》的傳承淵源考〉，《宗教學研究》1，2006 年，頁 45-50。另見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Competing with the Northern Sung: The Liao Buddhist Canon,” 王耀庭編，《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 年，頁 77-109。柳富鉉，《漢文大藏經異文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年，頁 85-124。

<sup>2</sup> 參見 Paul Demiéville, “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les éditions imprimées du canon

藏》現存的一些經卷中所保存的插畫藝術，它們的價值也被藝術史家所研究，例如哈佛大學的羅樾（Max Loehr, 1903-1988）教授曾有專書研究《秘藏詮》中的插畫。<sup>3</sup>最近幾年大陸學者方廣錫和李際寧收集到現保存於中、美、日等地的《開寶藏》各經殘卷共十二卷，將它們重新裝幀印刷，這就是新出版的《開寶遺珍》，它的出版無疑為《開寶藏》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sup>4</sup>不僅《開寶藏》的內容需要與現存的大藏經，如《高麗藏》和《趙城藏》等對勘，更重要的是，正如最近西方學界有關研究中國印刷史新著中所提示的，《開寶藏》的研究必須放在九世紀到十世紀的中國印刷史背景中來研究。<sup>5</sup>

---

bouddhique,” in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ed. Paul Pelliot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1953), pp. 128-131. Kenneth Ch'en, “Notes on the Sung and Yuan Tripitak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 1/2 (1951): 208-214. L. C. Goodrich, “Earliest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Tripitka,” *Visvabharati Quarterly* 19, 3 (1953-1954): 215-220.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 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吳光清在他的文章中也簡單地討論了《開寶藏》的開刻，參見 K. T. Wu, “Chinese Printing under Four Alien Dynasties (916-1368 A. D.),”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 3/4 (1950): 447-523。

<sup>3</sup>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 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n.p., Plate 1-17.

<sup>4</sup> 方廣錫、李際寧主編，《開寶遺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sup>5</sup> 參見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Leiden; Boston: Brill, 2011); Timothy H. Barrett, *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現存《開寶藏》印本殘卷，還有各種抄本、西域殘片保存在日本石山寺、七寺、靜嘉堂文庫、以及敦煌和吐魯番等地。參見王丁，〈初論《開寶藏》向西域的流傳——西域出土印本漢文佛典研究〉，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佛教文獻と文學——日臺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の記録2007》，東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實行委員會，2008年，頁67-96。

根據前人的研究和在對於新出版的《開寶遺珍》的研究基礎上，本文試圖將這一部重要的藏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宗教、政治和社會事件加以進一步研究。在這篇文章中，討論會著重於《開寶藏》在成都雕造的過程，聚焦《開寶藏》在成都的雕刻史，並做出這樣的假設：那就是《開寶藏》在成都的雕造很可能是在某一所寺院的監督下進行的。這一所寺院就是我們接下來所要研究的成都淨眾寺，也就是近現代曾出土精美佛像的萬福寺。<sup>6</sup>成都淨眾寺可能具有組織雕刻《開寶藏》的條件。根據宋代的記載，這裡曾有一座「傳經院」，也許是藏經印刷的經局所在。<sup>7</sup>總之，我們試圖把《開寶藏》置於當時流行的雕版印刷的文化中，還原《開寶藏》雕刻原貌和印刷文化背景，並且重新敘述雕版印刷如何催生了第一部刻本漢文大藏經。

## 一、十一世紀漢文大藏經在四川的流行和佛教儀式

毋庸置疑，唐宋時期四川成為雕版印刷的中心。四川的印刷文化和技術、穩定的政治環境、紙張和熟練印刷工人以及抄工的存在，從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第一部刻本藏經會在這裡產生。<sup>8</sup>《開寶藏》具有宋初四川印刷品的特點：版式為二十三行一面，十四字一行，而不是流行的十七字一行。與蜀刻大字本相似，其書風清逸寬舒，字體偏瘦，轉

<sup>6</sup> 有關淨眾寺出土的佛像，參見劉志遠、劉廳壁，《成都萬福寺石刻藝術》，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5年，頁1-7。

<sup>7</sup> 參見本文第五部分的詳細導論。

<sup>8</sup> 有關早期四川印刷史的情況，參見以下的英文論文：Jiang Wu, Lucille Chia, and Chen Zhichao, "The Birth of the First Printed Canon: the Kaibao Edition and its Impact," in *Spreading Buddha's Word in East Asia: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ed. Jiang Wu and Lucille Ch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5-180. 其中關於《開寶藏》在成都的雕造，該文提出了假說並提供簡短的敘述和論證。另外有關中文簡述，參見段玉明，《成都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頁187-188。

折明顯，運筆長且有力。但是這只是一個技術上的條件。另外還有宗教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作為佛教喪葬儀式的一部分，誦念漢文大藏經曾在四川地區廣泛流行，這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四川地區大藏經信仰的存在。

作為孝道的一種表現形式，一套整部大藏經的儀式性閱讀可以作為祭奠死去父母亡靈的儀式的一部分。這在最近重慶新發現的孝子王伯珪的一通碑文中可以看到。這通北宋的碑文，被定名為〈王長史轉念大藏經功德碑〉，詳細地記載了王伯珪為他的父親王長史所舉行的一個佛教超薦儀式。在這個宗教儀式中，主要的核心部分就是邀請僧眾誦讀一整部大藏經。這通碑文落款是天禧四年（1020），碑石長一百八公分，寬四十六公分，碑文十四行，滿行四十字，正書，一九八七年榮縣富東鄉王序村出土，現藏榮縣文物管理所。<sup>9</sup>碑文的完整錄文如下：

孤子男 伯珪等奉

亡父攝長史，從正月玖日，請參拾壹僧，就家開轉大藏經壹藏，并逐日齋僧。至貳月拾參日就墳，所設散所

□□者，以憑追薦。謹具轉念 功德數目如後。

轉大藏經一藏，總一千七十六部，計四百八十帙，共五千四十八卷。

轉大乘經五百一十五部，共二百三帙，計二千一百七十三卷。

轉大乘律二十六部，共五帙，計一十四卷。

轉大乘論九十七部，共五十帙，計五百一十八卷。 轉小乘經二百四十部，共四十八帙，計六百一十八卷。

轉小乘律五十四部，共五十五帙，計四百四十六卷。 轉小乘論三十六部，共七十二帙，計六百九十八卷。

轉聖賢傳集一百八部，共五十七帙，計五百四十一卷。 念般若多心經一千卷。 念佛慈護真言一萬遍。

<sup>9</sup> 榮縣並不在重慶轄區，不清楚為何收入重慶卷。

念解冤結真言一萬遍。念往生真言一萬遍。念破地獄真言一萬遍。念安土地真言一萬遍。

念摩訶般若波羅蜜一萬遍。齋計一千僧。右 伯珪等竊念體稟陰陽，受生 父母，功高

而天方竝矣，德厚乃地可比焉。欲盡孝思，唯敦南陔之雅什；擬伸薦奉，須憑 西域之靈文。伯珪

是以嚴潔廳廚，特邀緇侶，轉一藏之微言。既就，設千僧之妙供，圓諧併用，薦嚴 亡父長史生界。唯冀

洗六塵之煩惱，早悟生空；出 三界之苦源，頓拋幻化。又願見存眷屬，咸乞乂寧；當處神祇，俱霑勝利。伏乞

證明，稽首謹疏。天禧四年二月十三日。孤子 伯珪 伯瑛 姪男 伯瑾 伯珣 伯琪<sup>10</sup>

在碑文的後半部是與閱讀整部大藏經有關的一系列的咒語。根據碑文，這些咒語都應該被念一萬遍。最後，孝子王伯珪代表他的親屬寫了一篇祭文來表達他的對父母的感恩之情，並且明確的表示誦讀整部大藏經的目的是要表達他的孝親之道，落款年代題為「天禧四年二月十三日」。

根據這通碑文的內容，現在還不清楚這一次誦讀大藏經的底本到底是哪一個。但是這通碑文所提供的大藏經目錄和藏經各部的卷數與《開元釋教錄》的內容相吻合，這就表示這一部藏經的版本，很可能是根據智昇（約 681-786）的目錄，所據底本應該是四川地區流行的、依據《開元釋教錄》編輯的寫本藏經。雖然不能肯定它的底本是否是新雕造的《開寶藏》或者是一部寫本大藏經，但是它從一個側面證明大藏經在四川地

<sup>10</sup> 以上錄文參見中國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重慶》卷 9，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頁 202-203，圖檔見於頁 9，錄文以簡體字刊印，筆者據圖檔逕改為繁體字。對此碑文的詳細研究，參見李小強，〈〈宋王長史轉念功德碑〉《大藏經》史料割記〉，《中國典籍與文化》76，2011 年，頁 148-151。王伯珪孫王庠於《宋史》卷三七七有傳，見元·脫脫等撰，〈王庠列傳〉，《宋史》卷 377，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11657-11658。

區非常的流行，並在宗教儀式中被使用。<sup>11</sup>

## 二、大藏經在成都雕造的早期史料

雖然《開寶藏》的雕造是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但是宋代朝廷的官方文獻和《宋史》中，卻沒有關於這部大藏經雕造的詳細記載。只有幾部宋代和元代編撰的佛教史籍記錄了這一事件，但是它們所記載的內容詳略不同，出處不明，尤其是關於《開寶藏》在成都雕造的情況，更是語焉不詳。雖然曾被廣泛援引，但是被沒有作仔細分析。在以下的論述中，本文將這些內容按照時間順序，做一個排比，並且分析它們的資料來源。<sup>12</sup>

關於《開寶藏》雕造的最早的記錄，實際上是來源於宋人注唐代僧人神清的《北山錄》中一個簡短的記述。現存《北山錄》是根據 1068 年注釋本的一個元代重印本。這一條關於《開寶藏》的簡短記述，實際上是保留在成都當地的僧人慧寶所做的注釋當中，這個注釋出現在《北山錄》卷十〈外信篇十六〉。

今大宋皇帝造金銀字大藏經數藏，彫藏經印板一十三萬餘板，嚴飾天下寺舍。<sup>13</sup>

根據這一條記載，慧寶這裡所指的大宋皇帝一定是宋太祖。根據有關記

<sup>11</sup> 曹剛華，〈《大藏經》在兩宋民間社會的流傳〉，《社會科學》10，2006 年，頁 167-177。據曹氏文中提及四川石照縣於宋皇佑四年（1052）曾購買一部《大藏經》，具體情況不詳。

<sup>12</sup> 李富華、何梅已經將以下四條史料羅列，但是並未詳細分析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北山錄》慧寶注的重要性。參見氏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73-74。

<sup>13</sup> 《北山錄》卷 10，CBETA, T52, no. 2113, p. 632a9-10，另見昌彼得編，《北山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 年，頁 296。

載，他最先命令製作了幾部寫本的金銀字大藏經，並且下令雕造《開寶藏》。正如陳垣（1880-1971）所指出的那樣，慧寶一定是生活在北宋初年。<sup>14</sup>這一則記載很清楚的指出刻板大藏經的板片數量。這條記載雖然很短，它的來源年代和《開寶藏》最為接近，因此也就揭示了關於《開寶藏》在四川雕造的重要的資訊。在下一小節，我們將會重新考察這一則重要的資訊和慧寶在《北山錄》中所做的注釋來探討《開寶藏》。因為慧寶可能是《開寶藏》在成都雕造的重要見證人，他對於大藏經有極為細緻的觀察，在對《北山錄》所引用的經文的注釋中一定參考了一部寫本大藏經。他不但注明了經的卷數，同時也給出了經的紙數。<sup>15</sup>因此，他才會注意到《開寶藏》雕造的所有經板的具體數量，這一數字被以後有關《開寶藏》的史料引用，並沿用在現在通行的、關於《開寶藏》的描述中。<sup>16</sup>

關於《開寶藏》雕造的第二則重要的史料是天台僧人志磐（生卒不詳）所著《佛祖統紀》中的記載，這部書在 1269 年完成，是《開寶藏》雕造 300 年之後的簡要記載。

（開寶）四年……勅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sup>17</sup>

（太平興國）八年……成都先奉太祖勅造大藏經板成進上。<sup>18</sup>

<sup>14</sup>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上海書店，2001 年重印，頁 94。

<sup>15</sup> 慧寶在注釋中多次提到有關佛經的卷數和紙數，如：「舍利弗造《集異門足論》（二十卷一百八十九紙。玄奘譯）目連造《法蘊足論》（二十卷一百七十八紙。玄奘譯）迦多演那造《施設足論》（一萬八千頌。此未見行。上三論皆是如來在日諸弟子造也）玉毫既晦。提婆設磨造《識身足論》（十六卷。佛滅後一百年造。玄奘三藏譯）世友造《品類足論》（十八卷二百九十紙。佛滅後三百年造）《戒身足論》（三卷四十九紙。世友造。已上謂六足也）。見《北山錄》卷 2，CBETA, T52, no. 2113, p. 581c1-6。

<sup>16</sup> 英文翻譯參見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 13-14.

<sup>17</sup> 《佛祖統紀》卷 43，CBETA, T49, no. 2035, p. 396a21。

志磐是天台宗的一位僧人，他試圖撰寫一部佛教的編年史，其中以天台宗為他的重點。他廣泛地徵引了宋代的各種史料，其中有些已經亡佚。他偶爾會在他的書中，用注釋的形式指出他文獻的出處。關於上述這一則《開寶藏》的記載，他卻沒有注明出處。在他的書目中也沒有任何的跡象表明，他曾經參考過慧寶注《北山錄》，因此他並沒有提到《開寶藏》雕版的具體數量。但是他的確是提到了去四川雕造《開寶藏》的官員的名字。似乎志磐掌握了我們所不知道的一些史料，其中記載了這些具體的資訊。<sup>19</sup>

與以上的資訊內容相似，第三則記載來自念常（1282-？）的《佛祖通載》卷十八，這部佛教編年史創作於 1341 年。（原文注釋以粗體加底線表示，下同）。

（辛未） 詔成都造金銀字佛經各一藏。初戊辰九月廿七勅，兵部侍郎劉熙古監造。是年六月十一日勅，再造金字經一藏。

（壬申） 詔雕佛經一藏。計一十三萬板。<sup>20</sup>

這一則關於《開寶藏》的記載，又是在《佛祖統紀》編撰之後 100 年之後才出現。引文中的「辛未」年是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壬申」年是開寶五年（972）。念常提供了《開寶藏》雕造的一些背景和情況，尤

<sup>18</sup> 《佛祖統紀》卷 43，CBETA, T49, no.2035, p. 398c19-20。

<sup>19</sup> 馮國棟先生在與筆者的通信中指出志磐有可能大量參考了宋代的會要，而這些會要與今天的《宋會要輯稿》有很大不同。參見馮國棟，〈宋代佛教史學略論〉，《史學史研究》2，2005 年，頁 55-62。近年來，歐洲學者 Thomas Jülch 致力於英譯《佛祖統紀》，目前已經出版了第一卷。參見 Thomas Jülch, *Zhipan's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hina, Volume 1: Fozu Tongji, Juan 34-38: from the Times of the Buddha to the Nanbeichao Era* (Leiden: Brill, 2019)。

<sup>20</sup> 《佛祖歷代通載》卷 18，CBETA, T49, no.2036, p. 656c8-10。括號內文字為原注引文。

其是兩部寫本金銀字大藏經的情況。這裡《開寶藏》的具體板片數量已經給出，但是卻沒有寫出這個數量的史料出處，非常有可能的是念常參考了慧寶《北山錄》中的注釋，正如下面一則史料所提示的那樣。

第四則史料出現於覺岸（1286-？）的《釋氏稽古略》中，這部佛教編年史編撰於 1354 年，他也記載了《開寶藏》雕造的情況，但是很明顯他是根據以前的史料編輯而成。

戊辰十一月改開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詔成都府造金銀字佛經各一藏。勅兵部侍郎劉熙古監視。<sup>21</sup>

辛未開寶四年 遼保寧四年。六月十一日勅成都再造金字佛經一藏 宋僧史略並繫年錄

壬申開寶五年……帝自用兵乎列國。前後凡造金銀字佛經數藏。今年勅雕佛經印一藏。計一十三萬版 北山錄外信篇<sup>22</sup>

這一則史料也許是最完整的，對我們有價值的是這部編年史的作者給出了他的史料出處，一則是贊寧的《大宋僧史略》，以及一部可能已經亡佚的著作《繫年錄》和《北山錄》卷十〈外信篇〉。《繫年錄》應該已經亡佚，但是根據《釋氏稽古略》中他處對此書的援引，它的完整標題應該是《佛法繫年錄》，並且是由一位叫做慧鑒的天台宗僧人所撰寫。這位僧人居住在杭州的上天竺寺，曾是上天竺寺講經首座。<sup>23</sup>似乎這一部

<sup>21</sup> 劉熙古（903-976）在 967 年左右曾任成都知府。他也是一位學者並刊行了《切韻拾玉》。參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263，頁 9100-9102。

<sup>22</sup>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 14; 覺岸·《釋氏稽古略》卷 4, CBETA, T49, no. 2037, p. 860a20-b2。括號內出處為原文所加，查贊寧《大宋僧史略》中並無開寶四年再造金字藏經的記載。

<sup>23</sup> 參見《釋氏稽古略》卷 4, CBETA, T49, no. 2037, p. 892b5；又見同書所載：「繫年錄者（上天竺寺講經首座慧鑒之所編也）」，參《釋氏稽古略》卷 4, CBETA, T49, no. 2037, p. 859a16-17。

書對於宋初的佛教史實有非常詳細的記載，所以《釋氏稽古略》的作者經常援引這部書。

雖然最後的這三則史料是從後來的編年史中摘錄，但是它們的內容卻相當的一致，這些記載和史料都表明早在西元 968 年宋太祖就已經對大藏經有相當的關注，並且命令用金銀字來抄寫幾部寫本的大藏經。這個事件作為雕版大藏經開刻的先行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其中一部皇家的寫本大藏經可能會被用作是後來雕版大藏經的底本。根據上述《佛祖統記》的記載，在 971 年宋太祖派遣張從信到益州，也就是四川，開始雕造大藏經的工程，但是他卻並沒有指出雕版的數量，很可能是當時的作者志磐還沒有看到神清《北山錄》中的慧寶所做的注釋。在後面《佛祖通載》和《釋氏稽古略》兩則史料中，就已經把大藏經的經板的數量明確點出，並且指出它的來源是《北山錄》。毫無疑問，正如很多史料所顯示，《開寶藏》確實是在成都雕造，並且是根據當地的寫本大藏經為底本，雖然這個底本的性質和內容我們目前還不清楚。<sup>24</sup>

### 三、慧寶《北山錄》注釋中所見北宋初年成都佛教的情況

現在仍然不清楚《開寶藏》在成都雕造將近十年的情況，很多關於《開寶藏》的研究，對於佛教史料的有關記載並沒有做深入的研究。這裡我們必須回到關於《開寶藏》的最原始的記載當中。這一則史料是成

---

<sup>24</sup> 除了正史之外，宋代的其他史料中也記載了《開寶藏》的情況。黃庭堅所撰〈智悟大師塔銘〉（北宋元豐八年十一月），記載懷謹大師生平中開封印經院關閉時尚有板片十六萬。「於是詔廢印經院，以經板十六萬，畀謹刻印，賜之。」參見許明編，《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塔銘墓誌部（北宋元豐）》，上海：上海書店，2018 年，頁 1405。此則史料承蒙王招國（定源）見告，在此致謝。另外，我們對《開寶藏》運到開封之後的情況相當了解。參見梁天錫，《北宋傳法院及其譯經制度》，香港：志蓮淨苑，2003 年，頁 111-116。

都的一位僧人所撰寫，因此他一定是對成都的佛教歷史和印刷史有一定的瞭解，因為他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開寶藏》板片的具體數字，這也是目前唯一被所有後來的史料所引用的材料的出處。

正如我在前面講到的，最早對《開寶藏》雕造的記載保存在慧寶《北山錄》的注釋中，這也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因為我們缺乏任何可靠的史料來研究《開寶藏》，而慧寶是《開寶藏》雕造同時代的見證人，那問題就是我們從《北山錄》慧寶的注釋中能夠了解到什麼？很顯然，本文對《北山錄》的解讀並不是著重於研究神清（？-820）的思想或者任何關於唐代的佛教情況，而是試圖通過閱讀《北山錄》及其注釋來把它作為研究北宋時期成都佛教的一個重要的史料。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人對《北山錄》做出這樣的解讀。

大部分的學者利用《北山錄》這一珍稀史料來研究唐代四川僧人神清的思想，尤其是從神清的敘述中理解唐代禪宗的崛起，所以神清的思想對於研究早期禪宗史有巨大的意義。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個版本是在北宋重印並且由成都僧人慧寶注釋，而且他的傳記附在了這本書的最後。這部著作在元代的時候曾經被重印，而且在晚明的時候還在被誦讀。在本世紀 30 年代時陳垣發現了這個元刻本，當時陳垣發現了兩個殘本並把它們拼在了一起，這才形成了現在看到的《北山錄》。在他發現並重印這個合併本之後，很快就被收錄在當時新編撰的《大正藏》中，但是編撰者，除了將書後手寫跋文收入正文，還刪去了書後元代僧人德珪所作的一卷《音釋》。<sup>25</sup>

<sup>25</sup> 陳垣最先發現了兩個不完整的元刻宋本，並將之拼成一個完整的本子，也就是現在《大正藏》所收錄的通行本。但是《大正藏》的編撰者卻將元僧德珪所著兩卷注釋刪去，殊為可惜。關於此本的源流以及《大正藏》本的錯訛疏漏，參見昌彼得編，《北山錄》，跋，頁 3-6。雖然本文《北山錄》引文出自《大正藏》，引文已經和原本對校過。近年尚有幾種《北山錄》的校釋本，參見富世平，《北

雖然神清《北山錄》已經被相當仔細地研究過，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北宋初年慧寶注釋中所提供的有關內容。慧寶的傳記也沒有收入現存的宋代僧傳中。但是關於他的一個簡短的傳記，被附在了宋代編注的《北山錄》的最後。在這個傳記開始標注作者的地方模糊不清，很有可能是根據重新編撰過的，也許是贊寧所編寫。<sup>26</sup>

### 後序

稟學賜紫□□ □贊□述

[0636a27] 草玄亭沙門諱慧寶。字光用。俗姓王氏。東□□玄武縣人也。其先世習儒素或陳力就列或高尚其事炳耀譜□弗具詳□大師卅歲出家。弱冠受戒。遊刃學海。以傳演為□□□□雅論。嘗陞座隱機。謂左右曰。吾歷觀僧史高□□□□□研精究內外。然後能垂世立教出類拔萃□□□□□□□□□□雙輪任重致遠未之前聞乃於講習外博覽群□□□□深於大易春秋窮極天人明白褒貶。當世名賢皆服膺請業造其門者。咸曰。登於龍門。纂三國簡要志十卷。原始要終，削陳壽之繁冗也。撰錦鳳囊十卷。隱括聖賢奇言善行。無遺逸也。□經摘題十卷。裁□□章鉤深索隱史家之流也。五味子三□□□□語論□□□□□也。玉谿新稟四十卷。歌□□行要堅深心要定□□□□□□□□□□念須慈忍量須寬。

明□曆丙子仲秋望日重

裝墨林項元汴持誦<sup>27</sup>

山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王閏吉，《北山錄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

<sup>26</sup> 關於贊寧《大宋僧史略》的最新研究，參閱魏雅博之新著，Albert Wel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Zanning and the Topical Compendium of the Buddhist Clergy (Da Song Seng Shilüe 大宋僧史略)*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8)。但是慧寶的傳記並未出現在贊寧的著作中。

<sup>27</sup> 見《北山錄》卷 10，CBETA, T52, no. 2113, p. 636a24-b16；昌彼得編，《北山

雖然在這則傳記中有些字模糊不清，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把慧寶的一生的情況概括出來。根據這一則簡短的傳記，慧寶是一位居住在成都草玄亭的僧人，這個地址相傳也就是漢代的大儒揚雄（53BC-18AD）在成都的住址。根據嚴耕望的研究，在草玄亭的原址上，有一座唐代寺廟叫做中興寺。<sup>28</sup>應該說草玄亭在唐代已經被納入了中興寺的範圍內。因此慧寶很可能是中興寺的一位僧人，他字「光用」，出生於玄武縣的姓王的儒者家庭。玄武縣也就是現在中江縣，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改為中江縣。他年紀很小就出家為僧，年二十而受具足戒。他以博學多聞著名，尤其是他的儒學造詣。他堅信一位高僧必須同時兼具外學，也就是儒家經典的學習。這也許是他為什麼選擇注釋神清的《北山錄》，因為同為四川僧人的神清和他具有相同的秉性。慧寶是一位非常多產的作者，他撰寫了一系列的著作，如《三國簡要志》、《錦鳳囊》、《五味子》和《玉溪新稿》等，所有這些著述都已經亡佚。根據這些材料，慧寶毫無疑問是宋初四川地區著名的文人僧。

這篇傳記卻沒有提到慧寶的生卒年，從慧寶注釋的語氣來看，他應該是生活在北宋初年，尤其是宋太祖的時代。因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將他的出生地玄武縣改為中江縣，後記中仍然使用玄武縣的舊稱，因此寫作年代應該早於 1012 年。因為慧寶提到了《開寶藏》完成的情況，他非常有可能經歷了《開寶藏》雕造的過程，並且參與到了校

---

錄》，頁 317。文本的有些部分已經渙漫不清。後序最後兩行為晚明讀經人手寫，被《大正藏》收入正文。陳垣在重印《北山錄》時，最先注意到慧寶的生平。昌彼得後來也有所提及。有關佛教人名辭典均未收錄。李國玲將宋初慧寶與韶州慧寶混淆。參見李國玲，《宋僧錄》，北京：線裝書局，2001 年，頁 953。

<sup>28</sup> 中興寺亦為國家官寺，後在 707 年改為龍興寺。參見嚴耕望，〈唐五代時期之成都〉，《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2，1981 年，頁 23-64。另見段玉明，《成都佛教史》，頁 103-104。關於揚雄在成都故宅的考察，參見四川省文史館編，《成都城坊古蹟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341-344。

對和雕造過程當中；所以他的卒年應該在 978 年到 1012 年之間。陳垣注意到慧寶提到的最早歷史事件發生在 973 年，而且他提到了贊寧的《大宋僧史略》和道原的《景德傳燈錄》（完成於 1004 年）。因此，慧寶的活躍期應該在 973 年到 1004 年之間。<sup>29</sup>

慧寶在注釋中多次提到有關佛經的卷數和紙數，如舍利弗造《集異門足論》，慧寶注為「二十卷一百八十九紙。玄奘譯。」目連造《法蘊足論》，慧寶注為「二十卷一百七十八紙。」世友造《品類足論》，慧寶注為「十八卷二百九十紙。」《戒身足論》，慧寶注為「三卷四十九紙。世友造。」迦多演尼造《發智論》，慧寶注為「十六卷三百六十五紙。」<sup>30</sup>關於梁太學江泌之女僧法尼所誦之「偽經」三十卷，慧寶注為「今藏內有題目而無經文，既非佛語，今在偽錄也。」<sup>31</sup>有關羅什所譯《妙法蓮花經》以及「馬鳴大士撰蘇遠拏太子歌詞並本行詩」，慧寶均標明「今在藏內。」<sup>32</sup>目前尚不清楚慧寶所使用的這一部寫本藏經的具體情況。

慧寶對《開寶藏》雕版的數量有非常詳細和精確的記錄，而且他曾經生活在宋太祖和太宗的時代生活，並且對《大藏經》非常熟悉、關心。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明他和《開寶藏》的關係，但是他是目前唯一且最早指出《開寶藏》板片數量的人，所以他非常有可能對《開寶藏》雕造的情況非常瞭解，甚至有可能參與其中。但是現在沒有宋代史料記載

<sup>29</sup>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上海書店，2001 年重印，頁 94。

<sup>30</sup> 以上參見《北山錄》卷 2，CBETA, T52, no. 2113, p. 581c1-7。慧寶這裡所引用的經論，多是出自《阿毘達磨六足論》，所引紙數均與《開元釋教錄》以及《開元釋教錄略出》不同。其中《戒身足論》應為《界身足論》。印順法師認為這部論並非世友所造，而是富樓那所造。參見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CBETA, Y36, no. 34, pp. 161a13-166a5。

<sup>31</sup> 《北山錄》卷 2，CBETA, T52, no. 2113, p. 582c21。

<sup>32</sup> 《北山錄》卷 4，CBETA, T52, no. 2113, p. 594c25-26；卷 9，p. 627a26-27。

《開寶藏》轉移到開封之前是如何雕造的。但是從慧寶《北山錄》的注釋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當時成都佛教的基本情況，《開寶藏》就是在宋初成都佛教繁榮的這個背景下得以雕造。

#### 四、關於《開寶藏》在成都雕造的一則來自十七世紀的史料

在一則相當晚出的碑文中，《開寶藏》成都雕造的歷史又被重新提及。這一通碑文是明末清初禪僧丈雪通醉（1610-1696）於 1690 年在成都撰寫。丈雪通醉是禪僧破山海明（1597-1666）的弟子。破山海明則是密雲圓悟（1566-1642）的傳法弟子。<sup>33</sup>丈雪通醉明末清初時在成都，並且復興了成都和周邊地區很多寺廟。他對於保護大藏經有濃厚的興趣，在〈光巖寺藏經樓記〉中，他簡述了建造光巖寺，也就是後來常樂寺藏經樓的歷史。常樂寺又被分為上古寺和下古寺，這裡的下古寺也就是後來發現《洪武南藏》的具體地點。所以說丈雪通醉的這一則碑文應該是記述明代《洪武南藏》的雕造和保存情況的。但是，當時似乎丈雪通醉並不知道藏經樓裡保存的是《洪武南藏》這一事實，反而錯誤地認為這一部藏經是從《開寶藏》的經板印刷而來，因此他反而提到的《開寶藏》的雕造和經板的儲存情況。

---

<sup>33</sup> 丈雪通醉對於大藏經極其重視，曾贈送半部寫本藏經給內江般若寺，並撰有〈般若寺重建藏經樓碑記〉，參見鄒作聖，〈有關丈雪禪師在內江的幾件事：紀念丈雪通醉禪師誕辰四百週年〉，《內江文史》27，內江：政協四川省內江市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2010 年，頁 1-10。有關明末禪宗的崛起，特別是密雲圓悟一係，參見拙著 Jiang Wu, *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5-92.

先是，宋祖勅造《大藏經》板刊於益部。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工藏，藏板正因寺，即今之萬福也。<sup>34</sup>

萬福寺在明代也曾經盛行一時。著名的明代文人黃輝（1555-1612）曾寫有〈重建萬福寺碑記〉一文，明確記載：

僧之言曰：「淨因寺，俗呼萬佛，近又易『佛』爲『福』矣。」相傳創於漢延熹，或曰即古淨衆寺，若竹林寺地。唐無相禪師建塔，鑄佛者萬，寺以故名。後塔毀，高節度駢取修羅城而名，今猶之。洪武中，蜀獻王就國，宮未就竣，多遊其地，遺像具在，時猶號竹林寺。<sup>35</sup>

黃輝並未提及《開寶藏》，只是提到「萬曆初，僧宗禪輩復印經金陵，募造閣度之。」<sup>36</sup>這可能是請印一部《永樂南藏》。

正如李富華和何梅指出的那樣，在這裡丈雪通醉把《洪武南藏》指認為是《開寶藏》經板的重印是錯誤的。<sup>37</sup>但是丈雪通醉的此一記述並非空穴來風，他很可能有別的資訊來源，才可能對於《開寶藏》藏板地點言之鑿鑿。雖然這一則史料的出現是在《開寶藏》雕造七百年之後，我們並不能輕易忽略關於《開寶藏》的這一則記載，這也許反映了地方

---

<sup>34</sup> 參見龍顯昭、蔡東洲編，《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頁537。「正因」應為「淨因」的誤寫，在南宋末年和元代，淨衆寺又名淨因寺。段玉明，《成都佛教史》，頁101-103。

<sup>35</sup> 黃輝，〈重建萬福寺碑記〉，《天啟新修成都府志》卷53，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1621年本，頁23。感謝龍達瑞、王斌提供這一史料。另外參見張子開，〈唐代成都府淨衆寺歷史沿革考〉，《新國學》1，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頁289-312。有關黃輝的研究，參閱艾靜文（Jennifer Eichman），“Intertextual Alliances: Huang Hui's Synthesis of Confucian and Buddhist Paths to Liberation,” *T'oung Pao* 100 (2014): 1-44.

<sup>36</sup> 黃輝，〈重建萬福寺碑記〉，頁23。

<sup>37</sup>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380。

的傳說或故事。這裡首要的問題是，丈雪通醉所指的萬福寺在明末清初到底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什麼情況？為什麼它會作為《開寶藏》藏板的地址被提及？

## 五、淨眾寺作為《開寶藏》雕造可能地點之探討

非常有意思的是，萬福寺實際上就是唐代十分有名的淨眾寺，並在唐代淨眾寺的基礎上重修。該寺漢延熹年間（158-167）就已立寺，梁時為安浦寺。唐代重建的淨眾寺是高麗僧人無相行化之地，在史料中有時誤寫為「淨泉寺」，「靜眾寺」等。無相，生於 684 年，卒於 762 年，當時又被稱作為「金和尚」，在初期禪宗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正如《歷代法寶記》所記載的那樣，無相把自己的法脈傳給了無住，並且形成了「淨眾——保唐」一系的「劍南」禪宗傳統，甚至影響了西藏吐蕃和雲南的佛教。<sup>38</sup>神清在《北山錄》的注釋中曾經這樣評價淨眾一系的禪法，「余昔觀淨眾禪門，崇而不僭，博而不佞，而未嘗率異驚俗，真曰大智閑閑之士也。」<sup>39</sup>可見他對淨眾寺的禪法相當讚同。

無相在成都非常有名。他還有一位著名的弟子即淨眾神會，曾在 720 年到 794 年住錫淨眾寺，並且吸引了許多當地官府和朝廷官員的支持。根據宗密的記載，宗密本人就受到了淨眾神會的強烈影響。因為淨眾寺可以舉辦盛大的授戒儀式，還取得了唐代官寺的地位。<sup>40</sup>武宗滅佛時，

---

<sup>38</sup> 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重印本，頁 235-38。

<sup>39</sup> 《北山錄》卷 6，CBETA, T52, no. 2113, p. 611b8-9。慧寶注為：「蜀淨眾寺金和尚，號無相禪師，本新羅王第三太子。於本國月生郡南寺出家，開元十六年至京，後入蜀至資中，謁詵公學禪定。入蜀止淨眾，付法門人神會。又有南印慧廣，又有安僧梁僧等，皆宗禪法也。」

<sup>40</sup> 參見 Wendi Adamek,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寺廟受到衝擊，大鐘被移入大慈寺，后又被送回。<sup>41</sup>後來，這座寺廟的名稱在宋代被改為淨因寺。因為寺院中有很多佛像，民間又稱為萬佛寺。這個民間傳說應該是真實的，因為在十九世紀末和 1950 年代這裡出土了很多佛像和佛頭，成為了唐代藝術的瑰寶。在明代萬佛寺又稱作萬福寺，而且重建後的寺廟也就以萬福為名。<sup>42</sup>

丈雪通醉把《開寶藏》藏板地點指定為萬福寺即唐代的淨眾寺，也許是根據當地的民間傳說或叢林裡的口傳。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非常好的證據來和丈雪通醉的看法相印證，而且他僅僅指出是藏板地點。但是我們以下關於淨眾寺的具體考察揭示出它有可能、也有能力組織《開寶藏》的雕版和印刷工作。

雖然唐代淨眾寺的成立，被普遍的認為是高麗僧金和尚在 728 年所

---

*its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76-290. 另見 Peter Gregory, *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reprint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 37-54. 閔泳珪著，李千石翻譯，〈無相的淨眾寺〉，《宗教學研究》，1993，頁 26-27。有關唐代官寺的情況，參見聶順新，〈唐代佛教官寺特殊功能研究〉，《世界宗教研究》5，2018 年，頁 48-58。

<sup>41</sup> 〈唐成都淨眾寺無相傳〉有如下記載：「先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淨眾例從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興釋氏，其鐘卻還淨眾。」見《宋高僧傳》卷 19，CBETA, T50, no. 2061, p. 832 c24-26。

<sup>42</sup> 根據嚴耕望文，淨眾寺有如下唐宋碑文存目：許同，〈淨眾寺修律院記〉，貞元十八年，《寶刻類編》四；僧了之，〈再建立淨眾寺碑誌共五所記〉，景福二年，《寶刻叢編》七；劉曦度，〈修淨眾寺碑〉，後蜀廣政四年，《蜀中廣記》二。僧人傳記有〈唐成都淨眾寺無相傳〉，贊寧，《宋高僧傳》卷 19；〈唐淨眾寺神會傳〉，贊寧，《宋高僧傳》卷 9；〈周僞蜀淨眾寺僧緘傳〉，贊寧，《宋高僧傳》卷 22。見嚴耕望，〈唐五代時期之成都〉，頁 50-51。有關淨眾寺出土的佛像，參見劉志遠、劉廳壁，《成都萬福寺石刻藝術》，頁 1-7。有關萬福寺石刻藝術的英文研究，參見 Dorothy Wang, "Four Sichuan Buddhist Steles and the Beginnings of Pure Land Imagery in China," *Archives of Asian Art* 51 (1998/99): 56-79。

為，但是新出土的佛像和佛頭顯示這座寺廟至少在西元 427 年就已經存在。在唐代它成為成都的一座非常著名的寺院，不僅因為它有一口大鐘，而且它的佛像和壁畫也非常有名。這座寺院經常在地方史和地方誌中被提及，在五代末年和宋初，淨眾寺仍然非常活躍，在後蜀時期，也就是 947 年，寺院還新修了一座禪院。從《高僧傳》的〈周偽蜀淨眾寺僧緘傳〉中可以看出，五代時的淨眾寺竹林環繞。<sup>43</sup>雖然沒有詳細的關於淨眾寺寺院格局的記載，但是有少量的建築被各種的史料所提及，比如說紀念無相的「影堂」，「延壽禪院」，「松溪院」，「七祖院」以及杜琮的祠堂等。<sup>44</sup>對我們來說比較重要的是，淨眾寺還有一個「傳經院」。這在唐末的詩人鄭谷的詩中有所表示。鄭谷在詩中提到他曾經參訪淨眾寺，並且觀摩了「傳經院」中的壁畫松，並寫詩為贊：

危根瘦蓋聳孤峰，珍重江僧好筆蹤。得向游人多處畫，却勝澗底作真松。<sup>45</sup>

這首詩寫於西元 880 年到 893 年之間，但是並沒有透露有關傳經院的訊息。唐宋以傳經院為名的寺院並不多，雖然尚並不清楚這個傳經院的具體功能，但是從它的名稱來看，它很可能是專門為傳播佛經甚至抄寫、印刷所設立，當時非常有可能保存著一部寫本大藏經，它的名字暗

<sup>43</sup> 〈周偽蜀淨眾寺僧緘傳〉有云：「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歲於偽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宋高僧傳》卷 22，CBETA, T50, no. 2061, pp. 851b11-12。

<sup>44</sup> 〈周偽蜀淨眾寺僧緘傳〉有云：「攜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幽公杜琮之祠。」見《宋高僧傳》卷 22，CBETA, T50, no. 2061, p. 851b25-26。

<sup>45</sup> 這些詩文包括〈西蜀淨眾寺松溪八韻兼寄小筆崔處士〉（頁 141）；〈七祖院小山〉（頁 225）；〈傳經院壁畫松〉（頁 233）；〈水〉（西蜀淨眾寺五題）（頁 273）。有關他的傳記資料，參見鄭谷著，巖壽激、黃明、趙昌平箋，《鄭谷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附錄 4，頁 478-481。鄭谷與贊寧的關係密切。

示著它在傳播佛法和佛經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使人聯想起《開寶藏》經板轉運到開封後，宋太宗就成立了「傳法院」，專門負責大藏經的編撰和雕版印刷，這與淨眾寺所設立的「傳經院」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繫。<sup>46</sup>在對成都地方史的考察中，我們還沒有發現其他的寺院在十世紀的早期存在相似的建築。即使是在成都當時最大的寺廟群，也就是大聖慈寺所有的九十六個附屬庵院中，也沒有一座叫做傳經院或者傳法院的。<sup>47</sup>非常有可能這個淨眾寺中的傳經院是為傳播或者是印刷佛經而建立的，因此它可以更好的利用當時在成都的先進的印刷技術，成為佛經印刷和傳播的地方中心。<sup>48</sup>

在最近對淨眾寺在北宋的歷史研究當中，有學者指出淨眾寺是北宋紙幣「交子」的誕生地。尤其是在南宋的一則史料中提到了「交子」誕生的具體過程。在元代費著的〈楮幣譜〉中，有一則提到了淨眾寺。

隆興元年（1163），始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淨眾寺。紹熙五年（1194），始創抄紙場於寺之旁，謫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雜役三十人。<sup>49</sup>

這一則簡短的記載經常被用來證明淨眾寺是交子的誕生地，它強烈

<sup>46</sup> 晚唐藏經儲藏之所多稱為「經樓」、「經堂」、「藏經院」、「經藏院」、「輪藏」等。

<sup>47</sup> 馮修齊，〈大聖慈寺九十六院新考〉，《文史雜誌》2，2009年，頁47-51。

<sup>48</sup> 張子開，〈唐代成都府淨眾寺歷史沿革考〉，《新國學》1，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頁289-312。最近有關淨眾寺園林的挖掘報告已經出版，但是沒有發現與佛經刊刻有關的材料。參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編，《成都通錦路唐淨眾寺園林遺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

<sup>49</sup> 《全蜀藝文志》卷57，轉引自羅天雲、鄧中殊，〈成都淨眾寺是世界最早紙幣——交子的誕生地〉，《文史雜誌》4，2006年，頁18-21。有些學者對此持保留意見，參見胡昭曦，〈宋代交子具體誕生地探考雜識〉，《巴蜀歷史考察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頁356-361。

的暗示淨眾寺和政府印刷有著密切的關係。<sup>50</sup>這表明將淨眾寺作為紙幣的印刷場所並不是隨機的，其中必有先例可循。至少淨眾寺在南宋時的四川是一個印刷的中心，它更加有可能是和官方印刷有著重要的關係。至於北宋初年淨眾寺的情況，由於成都在《開寶藏》經板運到開封之後遭到王小波（？-994）、李順（？-995）起義的破壞，具體情況待考。

## 六、結論

所有這些事實都強烈的指向淨眾寺，也許它就是《開寶藏》在成都雕造、藏板、或者組織運作的可能地點。在雕造的過程中，宋代的朝廷非常有可能指派成都當地一座有大藏經和印刷經驗的寺院，比如淨眾寺，來組織具體的雕造工作。在藏經產生的歷史當中，佛寺總是在藏經的校對雕造和印刷中，有著領導的地位。這樣一座寺廟一定會有一部作為底本的寫本大藏經和一個雕工網路。丈雪通醉雖然沒有指出淨眾寺就是《開寶藏》的雕造地點，卻暗示淨眾寺就是經板儲存的地點。如果《開寶藏》不是在淨眾寺雕造，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雕造的工作是由獨立的經鋪或雕工來進行，然後再由淨眾寺把經板收集在寺裡。

這些雕工中很可能有大量的「社戶」或「寺戶」。比如嚴耕望所引《太平廣記》僧義孚傳中所提到「社戶造藏」的材料，就值得深入探討。嚴耕望提到四川藏經資源豐富，以致川外僧人「齎錢帛詣西川寫藏經」，甚至曾有賊人試圖從社戶那裡偷盜大藏經，這表明有些附屬寺廟的社戶與大藏經的編造有關。嚴耕望引用了《太平廣記》卷 116 中「僧義孚」條的記載如下：

<sup>50</sup> 〈周偽蜀淨眾寺僧緘傳〉有如下記載：「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厖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見《宋高僧傳》卷 22，CBETA, T50, no. 2061, p. 851b b27-29。

僧義孚，青社人，解琴。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府主優容之，俾齋錢帛，詣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為所有。一旦發覺，賣經者斃於枯木下。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唇反引，有以驢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見，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舍財，修功德，以孚為鑒戒。（出《冥報記》，明抄本作出《北夢瑣言》。）<sup>51</sup>

除了這一條孤證之外，雖然敦煌文獻中存在大量有關社戶的資料，但是目前還未找到「社戶造藏」的證據。

很有可能，社戶或者寺戶在成都藏經的雕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雕造大藏經在成都是一個重大的公共事件，這發生在這些經板被轉移到開封之前。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慧寶知道這些經板的具體數量，因為他所居住的草玄亭也就是中興寺距離成都西部淨眾寺的具體地點非常接近。在二零一九年八月在台灣佛光山舉行的大藏經會議上，萬金川教授在研究《開寶藏》雕造底本時，比對《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三各種藏經音義，發現《可洪音義》曾參考一部已經亡佚的《川音》一書，與一位叫做「厚大師」的蜀地高僧所作《西川厚大師經音》或許是同一部書。而這位「厚大師」所參考的寫本藏經則被稱為成都福感寺所藏《福感藏》。最近在福感寺遺址上出土了大量石質金字寫經碎片，因此萬教授推測，福感寺也有可能是《開寶藏》雕版所在地。<sup>52</sup>另一個與此有關

<sup>51</sup> 《太平廣記選輯》卷 116，CBETA, B17, no. 89, p. 249a5-8。嚴耕望所引用文字見《唐五代時期之成都》，頁 56-57。關於此條是否出自《冥報記》或者《北夢瑣言》，學界尚有爭論。

<sup>52</sup> 萬金川、釋覺冠，〈異文的類型分析與藏經源流考辨：以《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諸本對勘為例〉，《2019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9 年，頁 41-80，特別是頁 46-49（6-9）。有關福感寺歷史，參見段玉明，《成都佛教史》，頁 97-99。

的問題是《開寶藏》的經板是如何被運到開封的，這還需要在有關宋代早期交通和物資轉運的史料中尋找蛛絲馬跡。

雖然我們已經知道《開寶藏》在被運到開封之後的情況，但是它是如何在四川成都被雕造出來的過程仍然是一個謎。各種史料暗示《開寶藏》在成都的雕造並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它一定是與當地非常發達的雕刻印刷技術和四川在宋初的政治地位有關。地方文獻，比如慧寶所注神清《北山錄》，對於我們重新研究成都佛教在宋初的情況極有幫助。可以肯定，在宋初，四川地區已經發展出了一個流行的藏經崇拜的文化，這種文化促進了藏經在宗教儀式中的使用和大量傳播。因此，《開寶藏》一定是利用寺院本身的資源和政府的額外支持才得以雕造出來。而淨眾寺就是這樣一個成都著名的寺院和雕刻印刷中心，它有可能就是《開寶藏》雕刻的誕生地。本文雖然沒有發現確鑿的史料來證實這一猜想，但是經過梳理有關文獻，為進一步探討《開寶藏》在成都的雕刻史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

## 引用書目

### 佛教典籍與古籍

- 《佛祖統紀》，CBETA，T49，no. 2035。
- 《佛祖歷代通載》，CBETA，T49，no. 2036。
- 《釋氏稽古略》，CBETA，T49，no. 2037。
- 《宋高僧傳》，CBETA，T50，no. 2061。
- 《北山錄》，CBETA，T52，no. 2113。
- 《北山錄》，昌彼得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元刻本，1971。
- 《北山錄校注》，富世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 《北山錄校釋》，王閏吉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 《宋史》，元·脫脫等撰，臺北：鼎文書局，1980。
- 《開寶遺珍》，方廣鋁、李際寧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鄭谷詩集箋注》，鄭谷原著，巖壽激、黃明、趙昌平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現代專書、論文

- 中國文物研究所編，2002，《新中國出土墓誌·重慶》，北京：文物出版社。
- 王丁，2008，〈初論《開寶藏》向西域的流傳——西域出土印本漢文佛典研究〉，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南華大學主編，《佛教文獻と文學——日臺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の記録》，東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實行委員會，頁 67-96。
- 四川省文史館編，1987，《成都城坊古蹟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印順，1968，《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CBETA，Y36，no. 0034。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編，2018，《成都通錦路唐淨眾寺園林遺址》，北京：科學出版社。
- 李小強，2011，〈〈宋王長史轉念功德碑〉《大藏經》史料割記〉，《中國典籍與文化》76，頁 148-151。
- 李國玲，2001，《宋僧錄》，北京：線裝書局。
- 李富華、何梅，2003，《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竺沙雅章，2000，《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 柳富鉉，2014，《漢文大藏經異文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段玉明，2017，《成都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胡昭曦，2007，《巴蜀歷史考察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徐時儀，2006，〈《開寶藏》和《遼藏》的傳承淵源考〉，《宗教學研究》1，頁 45-50。
- 張子開，1999，〈唐代成都府淨眾寺歷史沿革考〉，《新國學》1，成都：巴蜀書社，頁 289-312。
- 曹剛華，2006，〈《大藏經》在兩宋民間社會刊刻、流傳考〉，《社會科學》10，頁 167-77。
- 梁天錫，2003，《北宋傳法院及其譯經制度》，香港：志蓮淨苑。
- 許明編，2018，《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塔銘墓誌部（北宋元豐）》，上海：上海書店。
- 陳垣，2001 重印，《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上海書店。
- 閔泳珪，李千石翻譯，1993，〈無相的淨眾寺〉，《宗教學研究》1，頁 26-27。
- 馮修齊，2009，〈大聖慈寺九十六院新考〉，《文史雜誌》2，頁 47-51。
- 馮國棟，2005，〈宋代佛教史學略論〉，《史學史研究》2，頁 55-62。
- 楊曾文，2018 年重印，《唐五代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萬金川、釋覺冠，2019，〈異文的類型分析與藏經源流考辨：以《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諸本對勘為例〉，《2019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頁 41-80。
- 鄒作聖，2010，〈有關丈雪禪師在內江的幾件事：紀念丈雪通醉禪師誕辰四百週年〉，《內江文史》27，頁 1-10。
- 龍顯昭、蔡東洲編，2004，《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成都：巴蜀書社。
- 聶順新，2018，〈唐代佛教官寺特殊功能研究〉，《世界宗教研究》5，頁 48-58。
- 羅天雲、鄧中殊，2006，〈成都淨眾寺是世界最早紙幣——交子的誕生地〉，《文史雜誌》4，頁 18-21。
- 嚴耕望，1981，〈唐五代時期之成都〉，《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2，頁 23-64。
- Adamek, Wendi. 2007.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rrett, Timothy H. 2008. *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Kenneth. 1951. "Notes on the Sung and Yuan Tripitaka." *Harvard Journal of*

- Asiatic Studies* 14, 1/2: 208-214.
- Chia, Lucille, and Hilde De Weerdt. 2011.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Leiden; Boston: Brill.
- Demiéville, Paul. 1953. "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les éditions imprimées du canon bouddhique." In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aul Pelliot.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pp. 128-131.
- Eichman, Jennifer (艾靜文). 2014. "Intertextual Alliances: Huang Hui's Synthesis of Confucian and Buddhist Paths to Liberation." *T'oung Pao* 100: 1-44.
- Goodrich, L. C. 1953-1954. "Earliest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Tripitka." *Visvabharati Quarterly* 19, 3: 215-220.
- Gregory, Peter. 2002. *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reprint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Jülch, Thomas. 2019. *Zhipan's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hina, Volume 1: Fozu Tongji, Juan 34-38: from the Times of the Buddha to the Nanbeichao Era*. Leiden: Brill.
- Ledderose, Lothar (雷德侯). 2008. "Competing with the Northern Sung: The Liao Buddhist Canon." 王耀庭編,《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77-109。
- Loehr, Max. 1968.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 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 Welter, Albert. 2018. *The Administr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Zanning and the Topical Compendium of the Buddhist Clergy (Da Song Seng Shilüe 大宋僧史略)*. New York: Cambria Press.
- Wu, Jiang (吳疆). 2008. *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Jiang, Lucille Chia, Chen Zhichao. 2016. "The Birth of the First Printed Canon: the Kaibao Edition and its Impact." In *Spreading Buddha's Word in East Asia: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Ed. Jiang Wu and Lucille Ch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45-180.
- Wu, K. T. (吳光清). 1950. "Chinese Printing under Four Alien Dynasties (916-1368 A. D.)."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 3/4: 447-523.